

水上先民

隋代發現並命名的高華嶼並非澎湖島而是釣魚島考析 ——以考析《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為主

施存龍 *

摘要 論證隋代官方艦隊赴流求國航程中六個關鍵問題，有破有立：陳稜所率的萬人大軍不可能是浙江的東陽郡加餘杭郡、會稽郡的兵，而應是長江口內廬江郡、江都水軍為主，及小部份在廣東義安郡招的南海兵；艦隊始發港不會是寧波或杭州，應是長江口江都港即今揚州海港；否認今泉州港某處為始發港，主張建安郡閩江口港口，仍起集結中轉及出國境作用；義安郡港口應在員水河口內，不會是今閩南的銅山島；陳稜所到的流求國不應是今台灣島東北部而應是今琉球中山島；赴流求國途中發現並命名的高華嶼不會是澎湖島而應是釣魚島。對於釣魚島原始發現，本文所發展的新亮點，一是提出陳稜航程始發地應是長江口內的江都，兵源和船源主力，亦由其提供，二是提出福州閩江口內長樂縣應是中途添船募員會合地，也是此行最後出發地。

關鍵詞 隋代；釣魚島；高華嶼；澎湖島；會稽郡；義安郡；陳稜；東陽兵

關於隋代陳稜率萬人艦船征流求國的全航程，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按照原始史料，大業五、六年間，只有陳與張鎮周同赴，而無與朱寬同行。陳、張這次航程，合理的解析應是陳稜帶了家鄉兵，集中到隋代在長江口內最大造船基地和水軍基地江都，率領隋煬帝撥給的適於出海的軍艦和水軍出海。經過舟山群島，南航到建安郡的閩江口內造船基地和熟悉東南海航路的人才基地——長樂縣吳航頭停泊。在那裡驗收預訂的更適於航海的福型新艦船和選招海員。然後將由建安郡募得的海員駕駛這批福船南航到義安郡，停泊在員水（今韓江）口內，在那裡新招募到的南海諸國的懂流求語言的兵員，裝上淡水等補給物，沿熟悉而安全的大陸海岸線北返，回到建安郡閩江口內，與等待在那裡的艦船會合，整編後航往流求國的新地方——國都所在地的中山島（今琉

球），而非重蹈朱寬前兩次不成功的老地方今台灣島北部。返程，載運預定要撥給福建的俘虜勞動力的船，回到建安郡，卸下一部份俘虜充實農村勞力。其餘俘虜押運船，隨同回長江水軍基地的大艦隊到江都，向煬帝獻俘。

在此次航途中發現了高華嶼，考定就是今天倍受中日關注和爭議的釣魚島。

但是也有學者提出完全不同的主張，具代表性之一的文章是福建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徐曉望先生《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該文提出的航程論點是：由陳稜、朱寬率浙中和浙北、浙東兵員赴流求國的航程，是從寧波港出海經舟山群島的衢山、岱山等島南航，到達今福建省南部沿海東山島，最後由該島港出發。到達的征戰地，即今台灣島東北部，並未去琉球群島。途中經過的高華嶼肯定是澎湖島，句龍嶼推測是雞籠嶼。

* 施存龍：原中國國家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該文不但顛覆了隋軍從義安郡啟航征琉球群島和發現釣魚島等重要歷史事件，也搞混了有關航海史地問題，大有商榷必要。尤其是該文先在《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3期上發表後，又向第二屆中國民間海神信仰與祭海文化資源開發保護研討會提交，從而被收入在2013年出版的《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一書中。文中論點還分別寫在他的專著和其他有關文章中，使之進一步擴大影響和推廣。本文從下述幾個方面考析。

一

陳稜所率的萬人大軍不可能是浙江的東陽郡加餘杭郡、會稽郡的兵，而應是長江口內廬江郡、江都水軍，及在廣東義安郡招的南海兵。

徐先生的文章（以下簡稱徐文）認為陳稜所率“東陽兵”，不僅是指浙省中部的東陽郡的兵，而且還包括浙北的餘杭郡和浙東的會稽郡的兵，才達到萬餘人規模。徐文說：“隋代的東陽郡在浙江省中部，即為今日的金華市”“浙江東陽郡是當時的建制，於情於理，……只會來自浙江東陽郡的士兵。”；又認為：“隋朝統一江南之初，一度撤銷會稽郡和餘姚郡，保留東陽郡，所以當時的東陽郡，很可能統治了浙江北部的多數地方，只有這樣，隋朝才能從東陽郡調出萬餘人的士兵。”意即東陽兵，應包括今杭嘉湖、紹興、寧波的兵在內才對。¹

這樣解釋有誤。按金華市，地處浙江中部，位居內陸，只有一條小河東陽江，歷來既不是軍事重兵駐地，更非陳朝和隋代造船基地和水軍基地，為甚麼不調隋代沿大江大湖、沿海水軍和造船基地的兵，卻要向一無海軍人才，二無軍用物資，三又距離出征地流求國遠的地方調兵呢？史籍未見說明，也未見今人出來解說清楚，都只是

照引原文。現見的《隋書·流求國》版本原文，恐對“東陽”一名存在問題。

請看《隋書·地理志》：“大業三年置餘杭郡。……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及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四縣入，大業初，置郡。”²南宋《寶慶四明志》中的沿革，寫定恢復會稽郡發生在大業三年。縣治在小溪鎮，即今鄞江橋。³既然史載：大業三年恢復越州復為會稽郡，婺州恢復為東陽郡。那麼，到隋大業五、六年時行政區劃分並未再變更，所調的“東陽兵”只能是指由婺州改稱的東陽郡的兵，不可能包括會稽郡和餘姚郡的兵。東陽郡當時並非駐有國家級和大地區級的駐軍營地，何有這支大軍？若從常住民眾戶口論，當時東陽郡一共只“統縣四，戶一萬九千八百五”，豈能抽出萬餘壯丁充兵？一戶抽一個兵丁？況且當時由於隋煬帝為開通南北大運河的餘杭一段，已超支耗用了浙北地區人民壯勞動力和軍人，連婦女也上工地，哪還有如此大規模兵力可抽？從各方面分析，說成是率浙中的東陽兵，於理不通。若再包括浙東軍，更不合情理。盡信書，不如無書。根本上說，“東陽兵”不見得是指浙江東陽郡的兵，恐此中有訛傳隱情。一是義安郡歷史上也曾有過“東揚”“東陽”地名；二是可能是陳稜家鄉兵，為歷陽郡等地的兵，發生歷經千餘年刻版流傳中一字之訛。

要研究陳稜赴流求國的兵源，《隋書》中還有兩句話，值得我們重視。那就是：《陳稜傳》中一句為隋文帝楊堅任命陳稜為開府（所謂“開府”，是指開建府署，辟置僚屬。），不久統領地方武裝。另一句在《流求國》中，為陳稜曾經從南海諸國招募士兵。兩句聯繫起來分析，他受命率兵赴流求國，《陳稜傳》說他是襄安人即巢湖地區（今屬安徽省無為縣），不久統領地方武裝，這就很可能帶了他熟悉而又聽命得力的安徽老家地方水軍，由於陳的地方軍很可能包括歷陽

水上先民

郡州的兵，集中到水軍基地江都（隋煬帝的大本營，今揚州市）時，煬帝增撥一批水軍，連人帶艦隊出長江口，南航去建安停泊。那裡既是歷來的造船和航海人才基地，又是朱寬前兩次赴流求國的台灣島北部的出發港，有工作基礎，可在那裡招軍要船。利用在建安新獲得的船和海員，駛往義安。在義安，就近招募南海諸國的壯丁加以一定訓練，充作懂流求語言的軍人。義安郡當地人口雖少，也總會招到少量當地兵。義安在梁代曾名東揚州，梁代又設過“東陽州”行政區，由於最後是由義安出發的，也許因而被襲稱為“東陽兵”。《隋書·地理志》有：“梁置東揚州，後改瀛州，及陳，州廢。平陳，置潮州。”⁴明代姚虞《嶺海輿圖》稱：“潮州府，故南海郡揭陽縣地，晉始置義安郡，梁為東陽州，為瀛洲，尋復義安，隋罷，置潮州，唐因之……。”⁵此說為清代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所認可：“義安，晉義熙九年分東官，立治海隅，梁兼置東陽州。……隋初曰潮州，領縣五，治海陽，屬揚州。”⁶可見《流求傳》中，陳稜所領導的“東陽兵”並非今浙江省東陽郡今金華市的兵。寫《隋書》的人乃是用從前梁代的老地名來講隋代的事而已。所按《隋書·地理志》，實際上“東陽兵”應是外來水軍為主，加上義安本地兵的混合兵。徐文說是浙江省東陽兵，固然是似是而非，而現今潮州有的學者認為主要是潮州招的兵，也是不對的。

二

艦隊始發港不會是寧波或杭州，應是長江口江都港即今揚州海港。《隋書》對始發港有省略。徐文認為：“對於陳稜的航行長達一個月不理解，……如果懂得陳的東陽兵是從浙東的港口出發，這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從浙江寧波到義安郡的港口，就是一個漫長的航程，然後還要轉向流求，前後用時一個多月，是可以理解的。”⁷這

就是說，這萬餘人大艦隊是從今寧波港前身出航的。就我們前面論定不可能有浙江的東陽兵而言，已無從寧波出海的前提。況且，陳稜的“東陽兵”經由句章出海之說並無史料證明。這裡姑且依徐文思路，退一步就事論事，那麼，今寧波市前身隋代為句章縣，是否具有承擔這樣大規模出航的港口條件呢？

對於載運這支大軍的艦船由哪裡提供，徐文避而未談，這個要素是繞不開的。由於東陽郡這個小內河地方不可能造航海的船，勢必要由海港來提供大批航海艦船。寧波在隋代稱句章縣。當代《寧波港史》指出：隋代句章縣縣治小溪鎮，“位於寧波平原西南邊緣的四明山麓，地處奉化江支流鄞江之端，……但那裡比較偏僻，水上交通需經過鄞江、奉化江幹流才能到達甬江，不論是東行出海，還是西去餘姚和會稽的水道都不及原來句章（曾是縣治所在地城山）來得便捷，因此句章縣治遷至小溪，但港口卻沒有隨縣治移向小溪。而是東遷至三江口。”⁸實際那時，外三江口城市和甬江港口要直到後世的唐代中期才開發。原句章港中心港域還處在姚江上游的城山江畔，既無可能建造巨艦或大量中小海船，即使有外來巨艦或數量眾多的中小海船，也容納不了。隋大業六年的句章港無論如何也不具備承擔此造船大任的能力。迄今既找不出一條隋代寧波港造船具體記載，也未見有一艘考古出土隋唐遠洋海船殘骸。僅能引述歐陽修《新唐書》中《韓滉傳》稱：“隋文帝楊堅於開皇十八年（589年）下詔說：‘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句章、鄞、餘姚當時都為吳越之地，應包括在內。”⁹由此，充其量，也只能窺見隋代句章港能造三丈長的海船而已。徐文還借鑑漢代句章港軍事活動史，期望說服讀者。但拿遠在西漢的合股平定沿岸內亂軍事行動事，怎能推論相隔744年後的隋代就

能單挑遠征他國軍事行動呢？沒有說服力。所以，認為始發出海港是寧波，是不可能的事。

徐文還引述後代舟山民間傳說而建陳稜廟宇，和祭祀海神習俗，來論證陳稜從寧波港出海南航，是經舟山群島北部海域的，¹⁰當然也是不符合前提的。

順便說一下，徐文所引述舟山市衢山有陳稜廟宇的事，原意是要證明他自己的從寧波港出發征流求的觀點，卻引出舟山當地人文章是主張艦隊是從錢塘江口出海的：“陳稜……這支出師流求的隋軍從浙江金華出發，沿富春江、錢塘江，從杭州灣進入東海。而岱衢洋正處長江、錢塘江入海口外緣。因此無論從長江沿岸入海還是從錢塘江入海，駛向東南，經過衢山，這是地理造成的必然。……衢山的意思是海上四達通衢之山”。¹¹並不認可徐文從寧波甬江口出海。不過，我認為從杭州出海之說也難以成立，第一，陳稜的“東陽兵”經過衢山之說並無史料證明。第二，假定是從東陽郡出兵，也不會在錢塘江口出海。因錢塘江口有湧潮是航行危險區，很難想像大批艦船會冒險從此出海。第三，我們退一步而論，假定是從錢塘江口出海，隋代的餘杭港也無能提供大批遠航海洋的艦船和相關物資。總之，無論隋代的句章港和餘杭港，都不可是陳稜大艦隊出海地。既無史料依據又不合情理。

那麼，也許有人反問：你說從江都港出海理由又何在呢？隋代的長江口不像今天那樣在上海市，而是距當時江都（今揚州市）不遠，海潮影響到那裡。這可從曾長駐在那裡的隋煬帝本人的詩詞為證。儘管《隋書》四篇有關紀傳均未反映陳稜兵首發港在何處，但從《陳稜傳》中透露，當楊玄感作亂時，“稜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可見他平時是在長江的江南營的水軍基地；“稜

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當隋煬帝被害後，“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可見陳稜作戰時至江都率兵襲擊敵人；新領導人當權後，又叫他負責駐守水軍基地和長江第一港城江都。這些情況雖發生在赴流求之後，但可折射看出他與江都關係的前因後果，我們說他從江都率部分艦船出發赴流求是在邏輯情理之中。

首發港的艦船應是由江都為主的港口在載運兵員時一起提供的，而非義安郡所能提供的，可能是由陳稜在煬帝授權下以從長江下游各地水軍基地和造船基地調來佔多數。今揚州，在漢代稱為廣陵，那時就設有官方造船工場稱為“船宮”，直到隋煬帝時，仍是長江下游能造大型的批量的造船基地。¹²該地私人造船業也很發達，唐代鑑真和尚第一次、第五次東渡日本的海船就是由廣陵（今揚州）民間造的。

三

在陳稜航程中建安郡閩江口港口，仍起中轉及提供補充性海員、海船作用。在《隋書》中，對朱寬在大陸使用的港口只提到一個建安，對陳、張艦隊在大陸使用的港口只提到一個義安，那麼，在陳稜、鎮周赴流求國航程中，對朱寬在兩次赴流求國中使用過的建安郡港口，是否棄而不用了呢？我認為，史書沒有提到使用，並不等於實際沒有再使用。

我分析，出長江口南航的艦隊，會到建安郡今福建閩江口的“吳船頭”添一些福船帶到義安。早在兩漢一個會稽郡統轄今浙江和福建兩省地時，後漢時有個冶縣，海運已較發達。《後漢書·鄭弘傳》載，中國的“舊交趾七郡，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今廣西地）、交趾（跨兩廣及越南國）、九真、日南（均今越南國），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冶縣縣治在哪

水上先民

裡，一向有兩說，一說在今浙東臨海縣，一說在今福州市，後漢時，冶縣改名東侯官。¹³我支持後一說。三國孫吳時，於吳永安三年（206年），置建安郡。在建安郡侯官（今閩侯縣）設管理造船的官員“典船校尉”，吳主孫皓把謫徒流放到該縣閩江口內今長樂縣城所在地造船。¹⁴後世稱為“吳航頭”。今地方人士認為那時“設船塢於畫眉台下，船塢里即今雲塢里，在今下櫓橋，下櫓揚帆，以現在西關碼頭附近作為對夷州今台灣航行的起點站，故該地古稱吳航頭。”¹⁵（本文並不苟同東吳時探索夷州是從該處出發，僅取其古地名對應今地之說。）這個地方，將近二千年來，一直沿稱為“吳航頭”，直到筆者為調查鄭和下西洋事跡，到長樂縣時，仍在提此名，東吳以後直到鄭和下西洋都是閩東造船要地之一。陳稜艦隊航經此地添加劈浪性能好的福船應是順理成章之事。晉太康三年（282年）設立晉安郡，轄侯官、原豐、溫麻等縣，在溫麻（今福建連江縣，在福州東北隅）設有專門造海船的工場叫“船屯”。¹⁶隋代，除此之外，建安郡範圍內已別無其他造船基地，當時南安即今泉州尚未興起。

四

陳稜航程中義安郡港口應是員水河口，不會是銅山島。

（一）應在義安郡員水河口內

《隋書·流求國》明確記載“帝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也就是陳稜此行最後從大陸離境駛向異域流求國的港口是在義安郡。按義安是一郡名，範圍較大。由於記載十分簡略，既未直接說明為甚麼要選從義安出發，又未指明在義安何處，較具體位置如縣名、河名、港名，因此使後人歧義。

我是主張陳稜出征港口在義安郡治（以今潮州為中心）下游港口即當時的員水出海口內（今稱潮州市韓江）。理由有四：第一，符合《隋書》記載“自義安浮海”。第二，當時郡治海陽縣在該江的上游，與其水上往來聯絡方便，符合依託城市、依靠行政權力好辦事的情理。第三，自然條件允許。郡治海陽縣旁臨通海的員水（江）即今韓江前身，河口內沿岸可以泊艦隊。避免外海風浪大。第四，今廣東省潮州一帶，無論官方還是獨立民間學者，多數認定陳稜是從他們義安郡潮州一帶港口始發的。但筆者對他們有關的其他某些論點未能苟同，如說陳稜帶的全部兵員主要是潮州本地招募的兵，艦船是義安當地造的，從潮州出擊的流求國是今台灣島等說法。

（二）銅山島即使屬義安郡也不會是出境港

徐文雖也認同《隋書》所說陳稜艦隊出發由義安郡，但他認為“隋代的義安郡，郡治在今潮州境內的海陽縣，所轄範圍除了粵東外，還有福建東南部諸縣。……隋朝統一南方之後，裁併州縣，依照當時的制度……漳州南部，仍應歸義安郡管轄。”¹⁷徐認為當時的義安郡北部包括今福建南境的東山島，符合《隋書》的從義安出發之說。

按隋代海寧縣是今揭陽市惠來縣，隋海陽是今潮州市潮安，隋潮陽縣是今汕頭市濠江區、潮陽區、潮南區，隋義招縣是今梅州市大埔縣。在今廣東省境內。雖然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解釋，綏安故城在今福建省漳浦縣西南，因而有可能包括東山島在內。但《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兩幅圖《隋淮南江表諸郡》《嶺南郡》，卻不承認東山島在隋代為義安郡轄境，而是劃在建安郡轄境。¹⁸因此，對這一尚有爭議說法，本文目前只能存疑，不選邊站。不過並不影響對該島是否為此次航程中的最後出境港作出判斷。

那麼，徐文又根據甚麼把義安郡港口落實到東山島即銅山島呢？徐文稱：“閩南人是中國的海上馬車夫，閩粵一帶遠航的水手，大多是閩南人。所以，隋代到過流求國的，應是閩南人。由他們帶隋軍出海航行流求，他們只會從閩南或粵東的口岸出發。因流求國位於台灣的北部，閩南人到流求國，最好是在南風季節由南部港口出發。”按徐此說，對唐晚期、宋、元是適合的，但隋代則脫離實際，並不適用。

恕我直言，徐文不夠嚴密，前後矛盾。前面寫着“陳稜的航行並非常規性的航行，它是一次探險，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既然大業六年，陳稜航行是對未知世界的探險性質，何來有閩南人領路呢？這裡說陳稜去流求國之前，閩南人不但已去過，並且熟悉程度已達到可領航的高水平。按徐說法，所謂流求國只限台灣北部，則陳稜去流求國之前，朱寬不是也已去過兩次了嗎，何謂未知？只有琉球才是朱寬和陳稜都未去過，才稱得上探索未知，但這點徐文又不肯承認。

徐文又說：“在義安郡管轄的眾多港口中，又以東山港最為可能。東山島，古稱銅山，歷來是通往台灣的重要港口。鄭成功的軍隊多次從這裡駛向澎湖列島，清代施琅進攻澎湖的福建水師，也是以東山島出發。至於廣東境內的義安郡港口，南澳港距大陸太遠，汕頭一直要到清代才開發，有名的柘林港偏小，不利於大艦隊停泊，所以，隋代抄略流求國的隋軍，最有可能從東山島的港口發兵。”¹⁹第一，試問“歷來”是以何時開始的歷來？包括隋以前和隋初嗎？筆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去過東山港，住下調查那裡對台開放商運的情況和島況，參觀東山縣史展覽，也查閱過有關地方志，並未發現有隋代事蹟，在查閱整個漳州史時也未發現。而徐文只能以清初鄭成功事例說事。我們豈能以千年後的後事來推論隋代之事。第二，按東山島在唐垂拱二年（686年）屬

漳浦縣地。直到明初，還只是該縣一處漁村，只是因設抗倭的千戶所和水寨才興起。正如普及書《八閩掌故大全·地名篇》所說：“東山島本屬漳浦縣的五、六都，以往僅為海陬漁村，民間牧藪而已。自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略海上，為防禦倭寇侵擾，設立海防，在島上置千戶所和水寨各一。《漳浦縣志》載：因‘地連五都之銅坑、銅鉢、易名銅山。故城、寨、所皆用銅山統稱之……’《銅山所志》云：‘銅山者，明防倭之水寨也，環海為區，屹立于五都之東，始稱東山。’……至清雍正十三年，始劃歸詔安縣管轄。……1916年5月置縣，……稱東山縣。”²⁰該島在隋代很荒僻，沒有經濟開發，缺乏城市依託，承擔不了啟航地大任。怎麼會放着郡治好條件（據今潮汕人文章說郡治初設於韓江東岸，即今潮州市潮安縣歸湖鎮，後遷今潮州城。待考。）不去利用，而偏要擇無法勝任的荒島呢？

五

陳稜所到的流求國不應是今台灣東北部而應是今琉球。

徐文全文貫徹的基點是宣傳所到流求國只限台灣島，未再向東邁出一步。而且前面多次稱是在台島北部：“流求國位於台灣的北部”，“《閩中異事》的發現，使我們了解流求國在台灣的北部”。²¹但論到後面，則因他把距流求國尚有一天航程的句龍嶼，推測在島北部的基隆港，無法自圓其說，最後乃將流求國定位在東北部：“句龍嶼最有可能是台灣島北部的一個島嶼，陳稜船隻來到此處後，轉向東行，抵達台灣東北部的流求國。”“艦隊到達此地（指句龍嶼即雞籠嶼），距離流求國所在的台灣東北，就只剩一日航程了。”²²

水上先民

按徐文認定的台灣島東北部，就是今宜蘭地區。這使我們不能不提出幾個問題：一是台灣東北地區，隋代已存在流求國的國都嗎？二是那時宜蘭地區有多少人口，以致隋軍有可能俘得一萬七千壯勞力？不可思議。三是那裡已具備《隋書·流求國傳》所描述的社會發展程度？四是宜蘭地區是個甚麼情況的地方？不妨對照一下。

關於自然環境，它位於台灣島東北部，宜蘭縣境內。西北以雪山山脈山麓帶為界，西南為中央山脈北段山麓，東臨太平洋，由蘭陽溪沖積而成的扇狀平原，以頭城、三星、蘇澳三地為頂點，外形略呈一等邊三角形，稱宜蘭三角。邊長均約30公里，面積約330平方公里，屬小型平原。考古資料上則有噶瑪蘭人居住的遺址。早期宜蘭，本稱噶瑪蘭，小名為“蛤仔灘”。地勢平坦，最低處在東北部頭城的南面，海拔僅一米左右，雨季時常為積水淹沒。這裡位於台灣省東部中央山脈的北端，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有“蘭雨”的雅號。為全台水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豐沛的雨水，在自山地流向海洋的過程中，所展示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則呈現了蘭陽平原地理環境獨特的空間。原為由地塊陷落而成的海灣；豐沛的雨水由北、西、南三面的山地，匯流刻蝕成眾多大小河流，並經侵蝕攜帶大量沙泥土石，一方面將海灣逐漸埋積成平原，另一方面則在出山處形成一系列的沖積扇。部分河水經由扇面繼續東流，但亦有部分河水在扇頂流入地下成為伏流，至扇端再度湧出，而在沖積扇的前端，海拔高度約15至20米處，形成一寬窄不一的湧泉帶。湧泉帶的泉水再匯流成河東流，使平原上的河流更為密佈。匯流成數條較大的河流，因受與海岸平行的數條南北向新舊沙丘的阻擋，無法直接東流入海，而於沙丘西側蜿蜒曲折，或向北，或向南流動，於海拔高度2-3米以下的地區形成低濕地，甚至沼澤地，最後才經過頭城、東港及頂寮等三處沙丘的缺口東流入海。蘭陽平

原由雨水、河水和湧泉所串聯組織而成的自然區，自北、西、南三面向東到海的空間變化順序是：山地及其河谷地帶、沖積扇帶、湧泉帶、低濕地帶、沼澤地帶、沙丘帶和海岸。現今宜蘭縣主體就是蘭陽平原。這裡與《隋書·流求國》所描述的山川面貌有哪些對得上號呢？根本對不上。

蘭陽平原社會發展史，據台灣考古界研究，三四千前即有泰雅族建立聚落。泰雅族為父系社會，民族勇猛剽悍，漢人俗稱其為番、野番或山番，由東南亞渡海漂流來到。最早進入蘭陽平原的先住民噶瑪蘭族，是以漁獵為其主要的維生方式。噶瑪蘭族為母系社會，民情憨厚，漢人俗稱其為熟番、化番或土番。百年前狩獵，已使用獵槍，舊照片現保存於宜蘭縣史館。因此，絕大部分選擇海拔高度五公尺以下的低濕帶、沼澤地及沙丘帶的沿河地區為其主要生活領域。原居於南投一帶，其後沿大安、大甲等溪谷向北遷移。而後來於二三百年前才進入噶瑪蘭地域及其周邊的泰雅族，包括南澳群、溪頭群、卡奧灣群和屈尺群等，雖以狩獵為生，散居內山，而未以蘭陽平原為其生活領域，但是為了獲得鹽等日常生活用品，亦經常翻過分水嶺，沿山地河谷帶進入蘭陽平原活動。

他們都沒有文字，因此原住民沒有自寫的史書。關於噶瑪蘭族的歷史記載始於1632年。1768年，漢人林漢生探訪噶瑪蘭，卻被殺害。1796年福建漳州漢人吳沙率眾擊潰噶瑪蘭族，進駐蘭陽平原。“惟當時吳（沙）使用火器甚猛，平埔族終於不敵潰走，撤至西勢之哆囉美遠、珍仔滿力、辛仔罕三社為後圖，吳乘勢侵入，沿途無敵，遂入頭圍。”（《宜蘭縣志》）。漢人進駐後，將原野與森林開墾為農田，代稱噶瑪蘭族的平埔族賴以維生的獵場逐漸消失，原有風俗也逐漸衰落，大多漢化。部分族人於一百多年前大舉遷移到花蓮、台東縣沿海一帶，成為今日島上

保持母語的平埔族，留在平原的族人則漸被繼續漢化。

以傳統水稻農業為主要謀生手段的漢族，於清嘉慶元年（1796年）大規模進入蘭陽平原後，則選擇湧泉至低濕地之間，這一帶有泉水足夠灌溉，土地可開闢成田的適耕平原，作為其最早生活據點。並自此地帶向東到海及向西到山，逐漸擴張生活領域，最後不但打破原先族群的分佈界限，並且將整個平原徹底改造成以集約水稻耕作為主的農耕區。素有“蘭陽米倉”之稱。²³

以上自然狀況與社會發展情況與《隋書·流求國傳》情況完全不同。無論史料和考古成就都未能證明蘭陽平原在隋代曾存在過流求國。宜蘭縣歷史上成書的方志有：清代的《噶瑪蘭廳志》、《噶瑪蘭志略》、民國《宜蘭縣志》，均未反映證實有此重大史事。因此，流求國在台灣島東北部之說，是徐文設想出來的國家，但實際並不存在過。

徐文還拿可證明隋代陳稜去琉球途遇的高華嶼是釣魚島的宋代官員間一篇通信作解釋，說是“首先讓我想到的是，《閩中異事》所說的流求國，應當位於台灣的北部而不是沖繩島！”²⁴我認為從根本上搞錯了。《閩中異事》中明白寫着“其國別置館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²⁵這種情況只有琉球群島才可能有。君不見明代出使琉球的中國使者寫的紀錄也有此情況嗎？

關於陳稜所征的流求國應是今天的琉球群島的根據，筆者在《文化雜誌》上發表的《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中國航海家發現釣魚島》一文中所列11條理由，²⁶今天仍然適用。

此外，還應補充一點當時未指出的重要內容。眾所周知，“夷洲”是三國東吳孫權時代發現台

灣島時中國人的命名，這是迄今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那麼，唐朝韓愈所作《送鄭尚書序》中所說“其海外雜國，若東則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中，為什麼會有三個並列的國名流求、毛人、夷呢？按照徐文流求國唯是台灣的說法，則流求國就是夷洲了，何必列了“流求”，又再重複列“夷洲”呢？（且中間夾了個“毛人”。）這表明唐代官方人士韓愈心目中的“流求”是指琉球群島，所以才視與夷洲即今台灣是兩個不同地方。混淆的是宋代以後特別是近代日本染指琉球和台灣之後。

六

途中發現的高華嶼不會是澎湖島而應是釣魚島。徐文在其“關於高華嶼和句鼃嶼的推測”一節中宣稱：“只有澎湖島最適合高華嶼的條件。”²⁷但是我們研究結果，苟同不得。

（一）不應誤解《閩中異事》，把高華嶼解釋成是澎湖島。

而徐先生根據甚麼論斷高華嶼就是澎湖島呢？一是他說：

對照《隋書》相關記載：“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周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句鼃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如果明白義安郡及流求國之間的水程，就可知道，他們一定會經過澎湖列島（施按，為甚麼“一定會經過澎湖列島”，並未拿出理由），因而，高華嶼和句鼃嶼之間，必有一個是澎湖列島的島嶼。據《閩中異事》一書，高華嶼距泉州沿海有兩日路程。而《隋書》記載了從高華嶼到句鼃嶼的水程，卻沒有直接記載從義安郡到句鼃嶼的水程，人

水上先民

們估計，《隋書》記載建安郡到流求的水程為五天，減去高華嶼到句鼃嶼的兩天及句鼃嶼到流求的一天，這應當就是隋軍從義安郡到高華嶼的水程。也就是說，從義安到高華嶼，應當是兩天。（施按，《隋書》只間接說建安郡到到高華嶼的水程，並沒有說從義安郡到高華嶼的水程！）這樣說來，高華嶼距泉州和義安分別有兩日路程。會更清楚一些。它是台灣海峽的某個島嶼，距離義安郡和泉州的海口，分別有兩天水程。

徐文繞來繞去，最後要說的話，就是這兩天水程，可定高華嶼必在澎湖列島內。然而問題是，這個航程是徐先生代替陳稜設計出來的，並不能代表隋軍實際水程。我們理解《隋書》，其水程應是從義安郡治下游的河口港，載上在那裡招收的士兵沿安全的大陸海岸線北上，一般說，至海峽較狹窄和安全的莆田縣海外東折航行；本例因還要到閩江口內與等泊在那裡的艦隊會合，所以先要回到那裡，整編人員和艦船後，再出航東行過海峽，駛過台灣島北的海域再略向東北偏航，經高華嶼，徑往琉球群島。不應自找麻煩，自投險路，選在台灣海峽南部闊的地方向東岸橫渡，並先到澎湖列島，再從澎湖列島到台灣島沿岸，由台灣島沿西南岸北航。所以，陳艦隊去流求國，無論是到台灣島東北還是去琉球，都不會經澎湖列島這麼走。

徐文說澎湖島是澎湖列島中人口最多的島，所以符合《閩中異事》中所記載高華嶼上，“1,000 多民眾以漁業為生，每年都可製造大量的鹹魚。……只有主島才有可能居住上千戶從事漁業的人家。所以，綜合以上史料，只有澎湖島最適合高華嶼的條件。”²⁸行文不嚴謹，前半句才說島上有一千多漁民，後半句卻說成住有千戶漁民，一戶漁民能等於一個漁民嗎？這且不計

較，《閩中異事》原文寫的是“嶼上之民，作養臘者千計”，這應該理解指醃製鹹魚乾達千片，而不是指有成千的乃至有千戶漁民同時住在這個島嶼上製作鹹魚乾。筆者在抗日時到過象山半島，見岩山上製作曬晾大黃魚鯃，一戶漁民就可作許多片。

（二）宋代官方文獻已有澎湖島前身之名澎湖島。

自宋至明，古名“彭胡”或“彭湖”或“平湖”。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書於宋嘉定十四年，1221 年）說“自泉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彭湖。”²⁹而記載高華嶼的《閩中異事》也正是宋代官員的文獻。可見宋代時，澎湖嶼和高華嶼兩名是獨立各用的，從未發現過那個是另一個的又名或曾名。怎麼可能高華嶼就是澎湖島呢？

（三）澎湖島自然條件與高華嶼大不相同，怎麼會是同一個地方。

在台灣海峽的南部，台灣島的西南海域，有一組島群，現稱澎湖群島或澎湖列島。不久前媒體和專著都是稱由 64 個島嶼組成，但最近由衛星探測結果公佈為 90 個島嶼的島群。澎湖島為該列島的主島，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澎湖島自然條件是：面積為 64.24 平方公里。由火山熔岩而成的島，島上呈玄武岩景觀。少有植被，只生寸草，多仙人掌叢林，且地勢平坦，起伏很少，五十多米的小丘便被當地人視為“高地”。年平均氣溫為 27.7 攝氏度，夏涼冬暖，惟雨量稀少，風力強大，全年平均風速超過六級的大風日多達 144 天。其中，每年 11 月至翌年 1 月，大風日每月超過 20 天。每年除 6-8 月為南風外，其他月份多為東北季風，最大風速可達每秒 20 米以上。年降水量為 1,000 毫米，是台灣省雨量最少的地方。³⁰從

自然條件看，徐文所謂高華嶼應是澎湖島，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是：澎湖島高不過 50 米的平台型島形，不符合高華嶼作為隋代航標島要高聳的特點。具有兀立的高聳 280 米的釣魚島文高峰才符合。君不見現代人因在遠海中看不到澎湖島上自然高物作航標，才人工造了一座白色醒目的高塔作航標嗎？

（四）從航海情理論，前面已指出無必要先航抵澎湖島，然後再往琉球群島或台島東北？

若說艦隊要到那裡停泊，我們懂得一點航海的人，想不出有此需要。假定有某種特別原因要到那裡停泊，儘管澎湖主島比起列島中的花嶼、西嶼的自然條件好些、大些，但仍然不是萬餘軍人船隊的合適停泊之地。徐先生所以有這種看法，估計一是清末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說法的影響，藤田豐八認為高華嶼就是澎湖列島的花嶼。徐文雖然想到花嶼太小，表示不同意，但仍擺脫不了藤田定在澎湖列島的思路，乃找了列島中最大的主島取代；二是受我國有一派人以為隋流求國僅指今台灣島的誤導，而把陳軍征戰對象限定在台灣島西南部。雖然徐文改為在台島的東北部，其航程仍自己設限未跨越到台灣島以東的海域，只得在島以西海域中找對象，於是找在澎湖島身上。

（五）有人說依據《列子·湯問》中的神山方壺山就是漢《十洲記》和晉《拾遺記》中的方丈島，亦即今澎湖島。³¹

這等於說，中國人最早發現澎湖島是在三千幾百年前商湯時，這當然荒唐（這裡不能詳論，另有論文）。中國人何時移民澎湖島？台灣的連橫先生《台灣通史》說：

而澎湖之有居人，尤遠在秦、漢之際。……而其見於載籍者，則始於隋代爾。《海防考》曰：“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其嶼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為廬舍，推年大者為長，畋漁為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鼂（牦）耳為記。稜至，撫之，未久而去。”是為中國經略澎湖之始。³²

連先生在書中把大業三年才封為虎賁頭銜的陳稜說成是開皇時已封的頭銜，這是謬誤。他深信大業時陳稜到過澎湖島，並在那裡安撫了島上的漁民、牧民，還論斷為“是為經略澎湖之始”。按，不但開皇時，隋文帝有沒有派陳稜去經略過澎湖島，大業時，同樣也不曾有這件事。筆者再查《隋書》中的《高祖紀》《煬帝紀》《流求國傳》《陳稜傳》，不但並無這種記載，連“澎湖”或“平湖”（即今澎湖）兩字的影子都沒有出現。總之，有人說是秦漢之際有居人，只是猜測，也無確證。至於說隋代經略澎湖島，乃是後人誤論。但有史可稽的，宋代已統治和經營，已是無可爭辯的史實。而高華嶼一直是個無人定居島，只有季節性的漁民在島上加工鹹魚、曬魚乾，如筆者在《釣魚島自北宋起即歸屬中國新證》一文中介紹的《閩中異事》所記。³³

（六）明代官方地理書明言是兩地。

《大明一統志》所記琉球國山川說：“龜鼈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澎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

（七）高華嶼並非澎湖島的地圖證明。

第一，高華嶼與澎湖島，並非同一地方的不同時代的異名，而是不同的二地在不同時代的各

水上先民

名。明代嘉靖年間在東南海防總督胡宗憲幕下任參謀的專門研究抗倭海防的鄭若曾在他《雜著》一書的《萬里海防圖》（圖1）的左邊中部，有三個用方框的重要的圖註：“澎湖島，東離琉球五日”程，“高華嶼東離琉球三日”程，“元辟嶼東離琉球一日”程。在同書山川中稱：“東離琉球水程一日，高華嶼離琉球水程三日，隋遣武賁將陳稜率兵過此，……”還把隋代征流求國聯繫在一起。³⁴如果高華嶼就是澎湖島，那就距琉球的航程應是一樣的，怎麼會是一個要五天，一個只要三天呢？因此是兩個地方，乃不爭的事實。這裡有必要說明，該圖上述三註右邊，還有一系列橢圓形框內的地名，其中有釣魚嶼，人們可能會問：既然高華嶼就是釣魚嶼，為甚麼有兩個地名並存於同一幅圖內兩處呢？是否意味着是兩個不同島嶼呢？不是。左方框地名高華嶼則是記載古代老地名，右邊的橢圓形框內的地名釣魚嶼，表明的是明代現實地名以示承傳。實為同一地方。

第二，十二年前，澳門《文化雜誌》發表的《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琉球群島的貿易網絡》一文，附有一幅《琉球國圖》，圖左上方也有同類的三條方框說明：“澎湖島東離琉球五日”，“高華嶼東離琉球水程三日”，³⁵這裡也有必要指出，在這幅圖上，左下方還有帶半圓頂框內的彭家山、釣魚嶼等地名，其用意同上條，為同一地方在不同時代的異名，不可誤解為兩名是兩地。

該圖左下角有一條註文：“西南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可到琉球”。這是明代製圖時一般航程數據。“所”，在這裡是與衛、百戶那樣為明代海防編制，全稱為千戶所。梅花千戶所，“在福建閩江口長樂縣，明屬鎮東衛”。所一般都建有小城堡（我在福建去過崇武城、銅山城，所見即此類所城）。梅花所城在閩江口海隅的梅江滂，離縣城45里。洪武十年（1377年），江夏侯周德興奉命造城池，為省會福州的海上守衛門戶，“與連江（縣）小埕為犄角勢，不問潮之

漲落，均可通舟”。³⁶所以無論商船、軍船往往以其地為航海起迄標地。

第三，連古代日本認真的學者也清楚標明澎湖島與高華嶼是不同的兩地。日本人繪製於公元1789年，並在日本安政（相當中國清代咸豐年間）修訂版《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冊》的《大清國道程圖》上，在中國東南海域中，畫着兩組小島嶼，左下一組標名澎湖嶼，右上一組標名高華嶼，明白無誤地表明是兩個不同的島嶼。（圖2、圖3）如果高華嶼就是澎湖島，那麼，怎麼會有並列的高華嶼與澎湖嶼兩個島形和兩個地名在同一圖的不同位置呢？

如果高華嶼就是澎湖島，那麼宋、元、明、清的圖書既說有澎湖島，又說有高華嶼，豈不統統都錯了！這顯然不對！而現在，我們已證明隋之高華嶼即今之釣魚島。從而表明，釣魚島自古以來一直就是中國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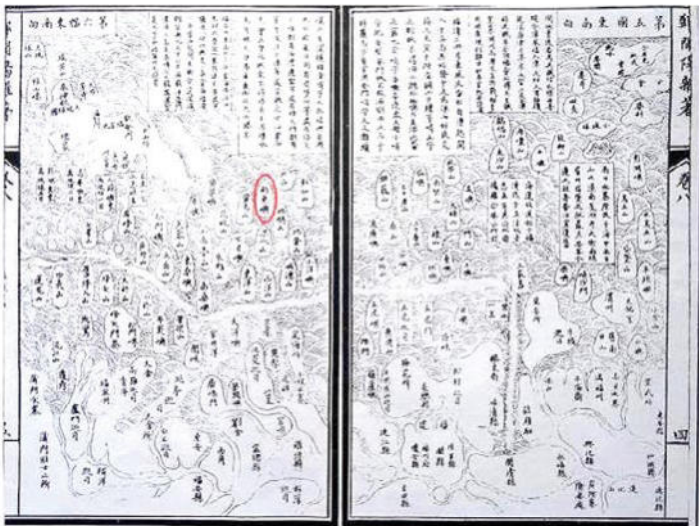


圖 1・[明]鄭若曾《萬里海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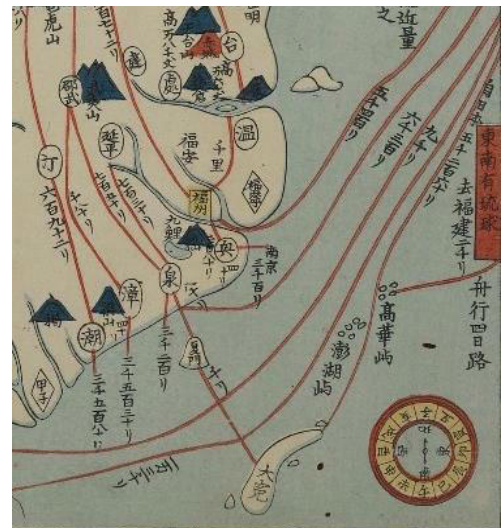


圖 2・日本安政四年版（1857 年）《大清國道程圖》，載《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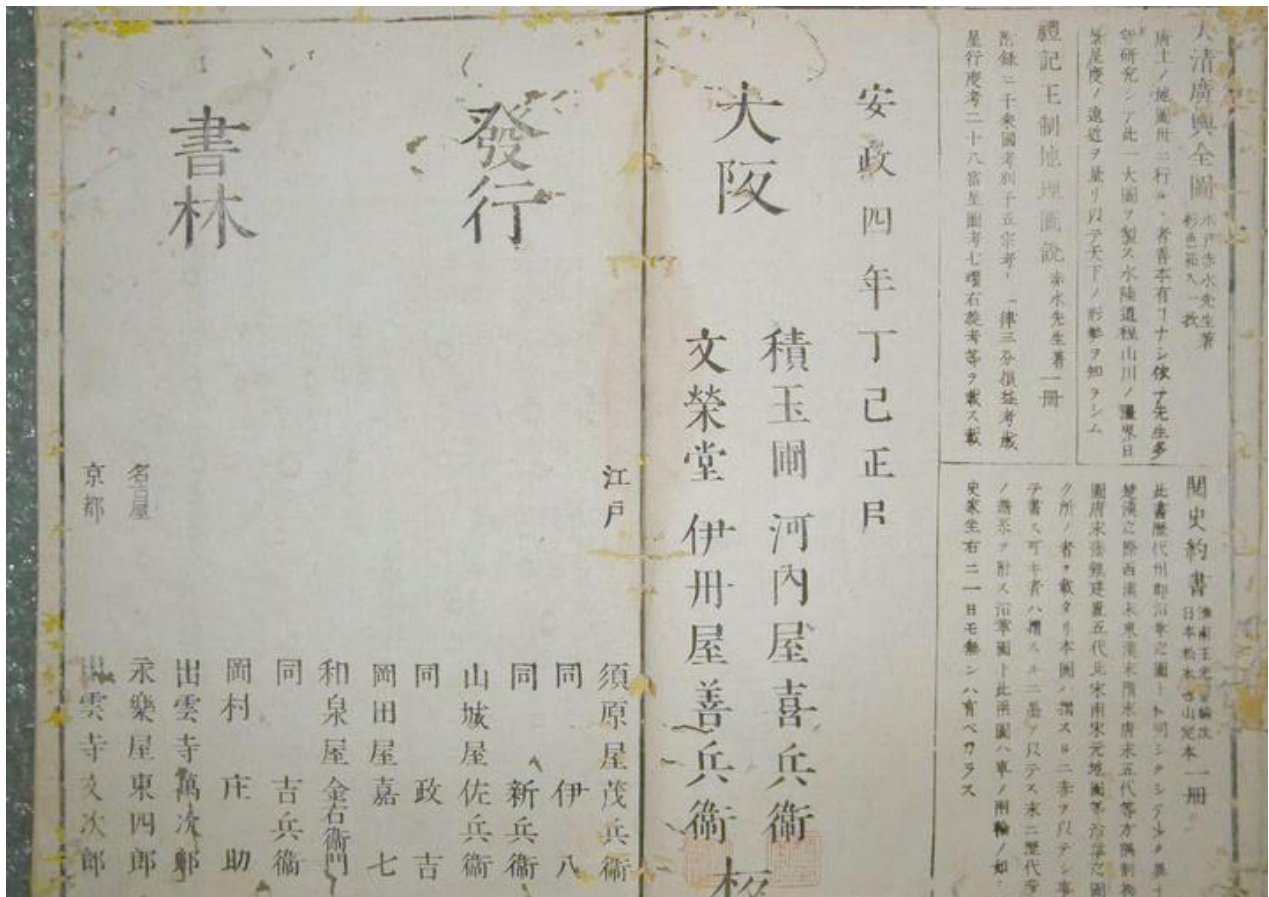


圖 3・日本安政四年版（1857 年）《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冊》版權頁

水上先民

註釋：

1.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3頁。以下所註該文頁碼均以《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一書為準。
2. 《隋書·地理志》。
3. 《鄞縣志》（上冊），《建置沿革政區設置》，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7頁；[南宋]《寶慶四明志》卷一，《沿革表》。
4. 《隋書·地理志》。
5.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載《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台北市東海大學，1965年，第202頁。
6.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載《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台北市東海大學，1965年，第202頁。
7.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4頁。
8. 鄭紹昌等：《寧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8頁。
9. 樂承耀：《寧波經濟史》，寧波出版社，2010年，第58頁；林士民：《寧波造船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4頁。
10.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3-234頁。
11. 汪國華：《陳將軍靈廟與陳稜出師琉球》，岱山作家網，2012-04-17。
12. 《揚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12-13頁。
13. 朱維幹：《福建史稿》（上冊），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45-46頁。
14.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孫皓傳》。
15. 長樂縣鄭和研究會：《鄭和研究文集》，2001年，第92頁。
16. 《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四，《船政》。
17.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6頁。
18.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21-22、24-25頁。
19.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6頁。
20. 王燕貽：《海角水寨銅山城》，載《八閩掌故大全·地名篇》，第174頁。
21.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6-237頁。
22.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8-239頁。
23. 有關宜蘭自然和歷史情況採自360網站編輯宜蘭平原條，和署名odanbd83的《宜蘭簡介》，360問答，匿名網友《宜蘭縣》，360問答，2015年12月25日，以及宜蘭地區考古等報導。
24.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5頁。
25. 可參見《文化雜誌》2014年冬季刊，總93期，第181頁所附《湧水集》原文。
26. 《文化雜誌》總第81期，第199-201頁。
27.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7頁。
28. 上海海事大學編：《中國民間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237頁。
29.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〇。
30. 360網編輯澎湖島。
31. 周運中：《上古東南海外五大神山考實》，載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編委：《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51頁。
32. 連橫：《台灣通史》，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2頁。
33. 可參見《文化雜誌》2014年冬季刊，總93期，第180-182頁。
34. [明]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八，《萬里海防圖》第六幅；卷七，《山川》。
35. 載澳門《文化雜誌》2004年春季刊，第8頁。
36. 福建《長樂縣志》卷四。

